

評介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林宏一**

作者：曾銳生(Steve Tsang)

出版項：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06.

一、前言

過去我們習於從中美關係與資本—共產兩極對抗的視角，來看待1950年代中華民國身處的國際局勢。確實，中華民國政府在退守台灣後，靠著韓戰爆發、美軍介入台海的機會，得以稍事喘息，並在美援的挹注之下穩定發展，此後中華民國各種重大的軍事與外交決策，都少不了美國幕後影響的痕跡；把對美關係視為此一時期最主要的外交框架，並不為過。

相形之下，自1950年1月6日起便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英國，既無外交關係，在中華民國的對外關係上似乎也無足輕重；然而甚少為人注意的是：在所有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中，只有英國獲准在台灣設立領

* 本篇書評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及指教勘誤，謹表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碩士班研究生。



事館；儘管於195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1950年代中後期，英國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卻經常暗助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海軍更曾在大陸沿海攔捕意圖與中國大陸通商的英國籍船隻，並因此多次與英國海軍艦艇瀕臨擦槍走火的衝突邊緣。這種種乍看之下並不協調的現象，是無法以單純的二元對立或美國為主的角度來解釋的，若非自英國、中華民國兩者的政策目標與利害糾葛切入，斷難一窺全貌。然而至今學界仍欠缺關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對英關係的專門著作，此一時期中英關係的歷史探討也往往被籠罩於中美關係的大脈絡之下。

本篇書評所要介紹的即是近年來關於此一空白領域的研究成果：牛津大學曾銳生教授(以下均稱其為「作者」)的*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以下均簡稱「本書」)。在本書中，曾教授的目的便是試圖釐清這一段先前並未得到重視的歷史，建立一套詮釋架構以說明上述看似彼此矛盾的現象，並為1950年代遠東地區的冷戰局勢提供另一個不同的視角。以下即對於本書作一簡要的內容概述，並試析其詮釋架構。

二、 本書內容及引用史料

全書除了序言及導論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冷戰脈絡(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說明全書論述的重點，以及英國與中華民國在二戰結束之後各自面對的難題。英國在歷經兩次大戰的嚴重損耗後，仍需保護其本土安全、維繫散布全球的利益，這促使英國在外交上極力避免在遠東爆發衝突，並在國共內戰中採取「保持立足點



(keep a foot in the door)」的現實政策，以求維護港九殖民地以及在華僑貿易利益，同時試圖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親近西方國家；而敗退到台灣一隅的中華民國政府，則一面力求生存，一面倡言東西陣營的大戰，進而藉機反攻大陸。這兩個國家追求的目標南轅北轍，卻在韓戰爆發之後共同遭受到美國力量的制約，在東亞的冷戰對峙架構中一起站在美國這一方，成為實質上的戰略夥伴。

第二章「中華民國的政策(The ROC's Policy)」描述中華民國政府在1950年代爭取英國支持的外交努力。儘管英國「背棄」了中華民國，但蔣介石與若干政府大員如葉公超、杭立武等人，對於英國還是抱有期望，認為英國縱然勢衰，仍能藉其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影響美國政府的外交布局。為求扭轉英國的遠東政策，中華民國政府不僅多次派遣董顯光、杭立武等人與英國官方秘密接觸，也在倫敦以民間機構為名從事宣傳與情蒐工作；雙方也同意繼續維持英國駐淡水的領事館。這些外交努力雖因雙方立場的差距而成效有限，但至少使得英國能較為瞭解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

第三章「英國的政策(British Policy)」分析1950年代英國看待台海兩岸的態度與手段。在韓戰爆發、美軍介入台海之後，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成為不可忽視的既成事實，而台灣的戰略位置，更被視為阻擋遠東「赤禍」蔓延東南亞影響英國在地利益的關鍵。英國軍方對台灣戰略價值的評估認同了「台灣不應失去」的看法，而相較於抗拒西方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無疑更樂於親近改革有成的中華民國政府。本章在闡述英國政府對台政策的演變之餘，並介紹英國駐淡水領事館與駐台海軍聯絡官(Naval Liaison Officer)的運作，強調這些機構對於雙方溝通的貢獻：淡水



領事館不但在實質上成爲英國駐中華民國使館，該館對蔣介石「難以真正反攻大陸」的判斷，更移除了英國早先對蔣介石引發台海大戰的疑懼。

第四章「兩個中國？(One China or Two?)」討論英國如何看待台灣的國際地位。作者認爲，英國並非支持一個或兩個中國，她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深受美國遠東政策、台灣內部局勢及本身「不願見台灣落入共黨集團之手」的方針所影響。英國承認其遠東利益有賴於美國的支持，交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有政策又未得到預期效果，故須對美國有所配合；台灣的得失將對東南亞造成「骨牌效應」，其五十萬大軍在東亞冷戰格局中更是舉足輕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的存續仍有必要；甚者，英國朝野不願背棄戰時盟友以及台灣居民的感性考量，與蔣介石在多次台海衝突中展現的自制力，都是英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和平與安全(Peace and Security)」討論英國對中華民國政府最深的疑懼：「反攻大陸」與「外島危機」會否在遠東引發大戰，致使美國無暇顧及西歐安全？本章以中華民國在大陸沿海的軍事行動及1954-55、1958兩次台海危機爲經緯，敘述1950年代英國在遠東阻止衝突並建構安全體系的努力。在1954年台海危機中，英國曾與美國授意紐西蘭提出神諭行動(Operation Oracle)，試圖重建穩定的台海局勢，卻使蔣介石誤以爲英國有意製造「兩個中國」，最後無疾而終，並使雙方關係進入195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此後英國全球影響力的衰敗，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之中曝露無遺，迫使她在1958年台海危機中不得不選擇跟隨美國，一改先前視金馬外島爲大戰導火線的態度，轉而支持中華民國繼續堅守外島的政策。

第六章「互惠與衝突(Mutual Interests and Conflicts)」說明英國與中華民國



的實質互動：在互惠方面，作者認為1950年代英鎊圈與台澎地區只有少量的經貿、民間交流，不足以增進彼此關係；而在衝突方面，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6月發動以「關閉匪區領海港口」為名的封鎖行動，斷絕中國大陸的對外海運，但經營大陸沿海貿易的船隻卻大多為英國籍，她們因前往「匪港」而遭受國軍攔檢或扣留的案件，成為1950年代英國與中華民國之間一大糾紛；最後，香港由於其特殊地位，成為國民黨反攻大陸時不可或缺的情報站與地下工作中心，作者並以1954年暗殺周恩來未遂案為例，探討1950年代香港國共諜報工作的鬥爭。

第七章「冷戰冤家(*The Cold War's Odd Couple*)」總結全書，強調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與英國，雖然沒有邦交、經貿往來極微，在國家目標上更是歧異甚大，但因冷戰的影響以及彼此互有所需的現實考量，終能異中求同，建立了特殊且始料未及的夥伴關係。

由於本書所探討的1950年代中(中華民國)英關係，堪稱是尚未開發的新領域，舊有研究甚少，因此必須採用大量一手資料以求從頭建構史實，作者在這方面用力甚勤，舉凡台北國史館《蔣檔》、杜魯門、艾森豪、顧維鈞等人的公私文件，以及英國外交部檔案、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國防部檔案等，均曾加以參考，並佐以多種報紙及回憶錄；美國對華關係及英美之間對於遠東局勢的看法與爭議，學界研究已頗有基礎，故作者在處理時徵引二手專書及論文較多；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除二手研究之外，主要使用已經出版的各項文件選集。



三、內容評述

本書在書名處便開宗明義：1950年代英國與中華民國漸趨友好的關係，乍看之下是十分奇異(odd)且始料未及的，不僅是由於英國在1949-50年間放棄中華民國政府的舊恨新仇，也由於這兩國在1950年代所抱持的目標近乎完全互斥。在如此惡劣的大前提與互動之下，為何雙方關係竟能在1950年代後期明顯改善，即為本書關切的焦點。

筆者認為，作者的闡釋可歸納為三項主要關鍵，並散見於全書，構成了論述的主調。首先，美國新興霸權的影響與英國勢力的衰微無疑是不可忽視的。作為老牌霸權，英國在對外政策上自有其獨到的邏輯與思考，論者嘗謂英國的戰略眼光不僅是配合美蘇兩極對立，更保有全球性的「帝國政策」；¹即使在意識型態上屬於反共陣營，但英國非但急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好，且不惜對之讓步也要維持遠東局勢穩定，便是基於現實利益與國力權衡之下的結果，已非單純的自由／共產二元對抗所能囊括。然而誠如作者所強調，英國歷經兩次大戰，國力終究今非昔比，相較於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強勢，英國被迫承認，遠東的利益必須依賴美國協助才能確保；蘇伊士運河危機對於英國國威的打擊，更使之無從在遠東堅持自己的信念，必須接受美國所主導的兩極對抗體系與遏阻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政策。英國原本就認為台灣是遠東地區對抗共黨勢力時不可失陷的戰略

¹ 如崔丕，〈美國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形成與英國(1950-1954年)〉，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21。



要點，因而與佔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具有共同的立場，而在美國的主導優勢之下，從這種共同立場出發衍生出某種程度的合作或默契，也就成為不得不然的結果。

第二項關鍵在於英國對「華」政策的推動及其檢討。作者認為英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好籠絡的企圖很明顯是失敗的，她不僅無法引誘中華人民共和國效法南斯拉夫領袖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自外於蘇聯集團，甚至無法藉由籠絡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保障英國在華利益：解放軍從未出面保護過英國船舶，且在1955年1月英國貨輪正偉健號(s. s. *Edendale*)被國軍戰機炸沉之前，英國船舶在大陸沿海所遭受過最嚴重的損害，竟是來自解放軍的攻擊(美中不足的是作者並未交代是何種攻擊)；留在大陸「保持立足點」的英裔，則在有系統的排擠之下血本無歸。至於外交關係方面，直到1954年6月，雙方才首度建立代辦級的國交，而派駐中國大陸的英國使領，率多認為自己沒有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重視，反倒是不受英國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淡水領事館人員頗為尊重。這些挫折固然不足以如中華民國所希望的能夠讓英國回心轉意，但卻足以使英國政府在主觀上較能樂於在聯合國席次之爭等議題上，配合美國政策、暗助中華民國政府。

最後一項關鍵則是中華民國政府「自助而後人助」。作者對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發展不吝予以高度肯定，並認為中華民國政府之所以能在1950年代爭取到英美的支持，正是由於蔣介石在台灣推動全面改革與各項建設所獲得的成功，以及由此厚植的實力與新形象。他指斥唐耐心(Nancy Tucker)漠視此一事實，才會用「蔣介石政權精於操縱他國政府」一語帶過



美國的對台援助²——但這無法解釋，同一個蔣介石政權在1948-1950年間操縱同一個杜魯門政府，怎麼就失敗了呢？同理，如果1958年八二三炮戰中的國軍沒有讓美軍顧問刮目相看，而是繼續如內戰期間一般不堪一擊的話，那麼艾森豪又何必爲了蔣政權干犯世界輿論，不惜以核武保衛金門，還拉住英國使之消極配合？

這對「冤家」也適足證明1950年代中華民國外交策略的務實與彈性。作者闡明，基於對戰後英國影響力的理解，蔣介石與葉公超等人可以壓抑一般官員心中被英國所「拋棄」的憤怒，特准英國淡水領事館繼續運作、增設海軍聯絡官(此一職務的弔詭在於，淡水領事館的交涉對象是台灣省政府，但台灣省政府沒有海軍，這位「海軍聯絡官」自然只能與「不被承認的中華民國」的海軍接洽)、多次派遣特使與英國官員密會，同時努力爭取英國各界人士來台訪問。作者肯定這種務實作風有其收效：正因淡水館所蒐集的情資，使英國判斷蔣介石雖想反攻大陸，但短期內只能防衛固守，從而破除了英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挑起遠東大戰的疑慮；淡水館對台灣各項發展的正面報導，與來自英國駐中國大陸地區使領的悲觀報告相比，有如天壤之別，更塑造英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嶄新印象。蔣介石因而得以達成他所期望的對英外交目標：不強求英國轉而承認中華民國，但在「不讓台灣落入共黨集團之手」的共同前提之上，使英國不至於在國際間危害中華民國，甚至能彼此暗中互助——善意並非單向供輸的，

² 唐耐心對於國民黨政權在台存續的解釋，見唐耐心著，新新聞編譯小組譯，《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1945-1992》(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中華民國也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投桃報李，站在支持英、法的立場。

本書的長處，在於問題意識清晰，論述理路也相當明確，並使用大量一手史料建構出若干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頗能使讀者在閱讀時一氣呵成，對於作者所想要表達的概念也能有效吸收；但相對地，也難免會令讀者有論述略嫌簡化之感。試舉一例：作者認為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使英國的霸權外表垮台，迫使英國必須進一步靠攏美國的遠東政策，並於1958年台海危機時配合美國及中華民國的利益；但是1956-1958年間，英國在遠東地區其實仍保有相當程度的活動自由，如1957年6月英國自行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禁運，此舉不僅違背美國立場，也與中華民國反對各國「資匪」的態度衝突，³作者未能解釋此一事件，雖無損於其立論，但難免使讀者誤以為1956年後英國在遠東便無所施展。

另一個美中不足之處在於，這部討論中英關係的著作，除了第二章探討中華民國的對英政策之外，其他章節仍舊予人「從英美看遠東」的印象，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局勢變化的決策過程未能在本書中充份表現。筆者相信這應該是由於作者蒐集資料時，台灣地區的官方檔案開放程度較諸目前仍顯不便所造成的，而以目前《外交部檔案》的開放情況來看，將來此一缺憾遲早能有補足的機會。

最後，筆者個人對於本書的感想是：本書不僅為1950年代中華民國—英國關係的領域建立了若干基本的史實與詮釋架構、告訴讀者東亞冷戰並非只有美蘇角逐的視角，更提醒了我們一段如今似乎因為政治氛圍而被刻

³ 〈外交部四十五年度工作考成報告表〉，引自周琇環，《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民國四十二年及四十五年)》(台北：國史館，2006)，583。



意忽略的過去：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建設革新與外交成就。誠如作者一再強調的，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的表現令外界刮目相看，才使得英、美對台灣及其統治者的評價，從原本看輕中華民國政府、僅注重台灣的地緣戰略角色，提升為將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可資信賴的反共力量，進而才使之得以發揮唐耐心所謂「操縱他國政府」的能為。而中華民國政府處理對英關係時的務實態度，更可能使一般習於認為蔣介石墨守「漢賊不兩立」思想的讀者大吃一驚。無論本書作者是否有意褒揚，但今天我們回顧冷戰時期的歷史時，當可跳脫舊有的神化／神話思維(無論是善神或是惡神)，從全新的角度重新肯定前人的功業，以及中華民國／台灣在冷戰時期遠東國際局勢中的重要地位。

